

于时代洪流中发现诗性之光

——简评邹汉明新作《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 尤 佑

的精神档案。正如穆旦诗中所言：“在耻辱里呼吸的，要开出倔强的花。”

青年穆旦的成长是一段隐秘的奋斗史。因为自述资料的匮乏，邹汉明采访了唐湜、郑敏、杨苡等人，并到南开大学档案馆搜寻穆旦留下的线索和迹象，以“现代诗人成长记”为脉，运用草蛇灰线的写法，以昆明、重庆、北京、沈阳等具体可感的生活空间为经线，同时以吴宓、赵瑞蕻、王佐良、郑敏、罗友伦等人的回忆为纬线，紧紧围绕求学、西南联大迁徙、远征军、野人山逃生等事件，以点带面，全面展现穆旦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记忆史。某些记忆川流在行动和语言中，它穿过某地并迂回前行。邹汉明深谙“记忆的主观性”和“时空的秩序性”，他找到了更贴近传主心灵的诗篇，以此更贴近灵魂的真实。而涉及爱情，邹汉明以万卫芳、曾淑昭、梁再冰、周与良为感情线，勾勒出一个渴望爱情与温暖的多情诗人形象。

毋庸置疑，穆旦的情感细腻而真挚，初恋万卫芳是天津的名门之后，从情感上给予诗人以安慰，也给予他“失恋的苦果”；曾淑昭是诗人在中航公司的恋人，他们有着一致的审美，是诗人心中永远的玛格丽；梁再冰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因诗结识，穆旦对其有爱慕，也算是一种“诗性苦恋”；最终，穆旦与周与良修成正果，在美国留学期间完婚。《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也就在这样的美好中结束。如果这是一个人生路口，穆旦永远停在那个瞬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阅读此传时，我发现邹汉明有意规避所谓的“身份确认”，比如：著名爱国诗人、“九叶诗派”代表诗人、中国新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等，而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呈现穆旦的创作风貌。此为这部传记的又一大特色，邹汉明以诗心写他传，将心比心，以人性的发展揣摩诗人的现代性生长，而又将个体人物的命运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至于诗解秘史，定会引起争议。多数人认为

诗歌偏于感性、轻逸，很难再现厚重且多维的历史。在诗与史哪一个更可靠的问题上，陈寅恪曾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史书往往因史官的视角而产生偏差，他还举例说《唐史》里，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难以厘清，结论自然不一。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于是，诗有可能成为更真实的史料。邹汉明客观地分析穆旦诗学的变迁与跃升，同时也还原了穆旦“普通且传奇”的人生。

从解读《春》《赞美》《出发》《诗八首》《旗》《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兵士》等作品看，邹汉明以“形式整齐”贯穿穆旦的学院派风格，也隐含穆旦沉稳的性情、“骄傲于自己的血”的热忱与孤傲。我甚至认为，穆旦的诗不是晦涩，也非完全的“现代主义”，而是紧贴世界时局的厚重之思。“火焰、深渊、死亡、赞美、赤裸、泥沼、小兵”等词语，无限贴合现实与人生的境况。细考穆旦的诗学变迁，除了受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托马斯·斯特勒那斯·艾略特和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的影响之外，穆旦更多的求索还是在西南联大的文教传统中探索汉语新诗的现实功用。穆旦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学观点，他的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范畴，进入“众人等于一人、一人等于众人的世界”，这一理念与徐迟的“抒情的放逐”、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闻一多的“要把诗写得像诗”的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穆旦也因此成为汉语新诗中“搏求者”的典型。

在穆旦这里，如何用文学改良人生乃至社会，不仅见诸诗歌，更见之于他主编的《新报》。而在邹汉明的传记里，穆旦的求索则贯穿现代汉诗的生长和整个时代的变迁。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穆旦的一生，深陷“热情、彷徨、苦闷、抗争、远行、沉寂、耻辱、笃行”的境遇，可他仍然倔强地保持诗人的“良善、纯粹与孤傲”，祈愿得到自由和幸福之花。

（作者系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穆旦原始档案。拙著第二部得以顺利完稿，离不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沈方，诗人，十数年来持续不断地谈论诗歌的老友，写作中，每遇到手头缺少相关的资料，首先就想到请他帮我下载电子书。由此，很多与穆旦有关的文档，只要我报上书名，他就耐心地在网上查找、下载并整理好发我。这些史料，大大方便了 my 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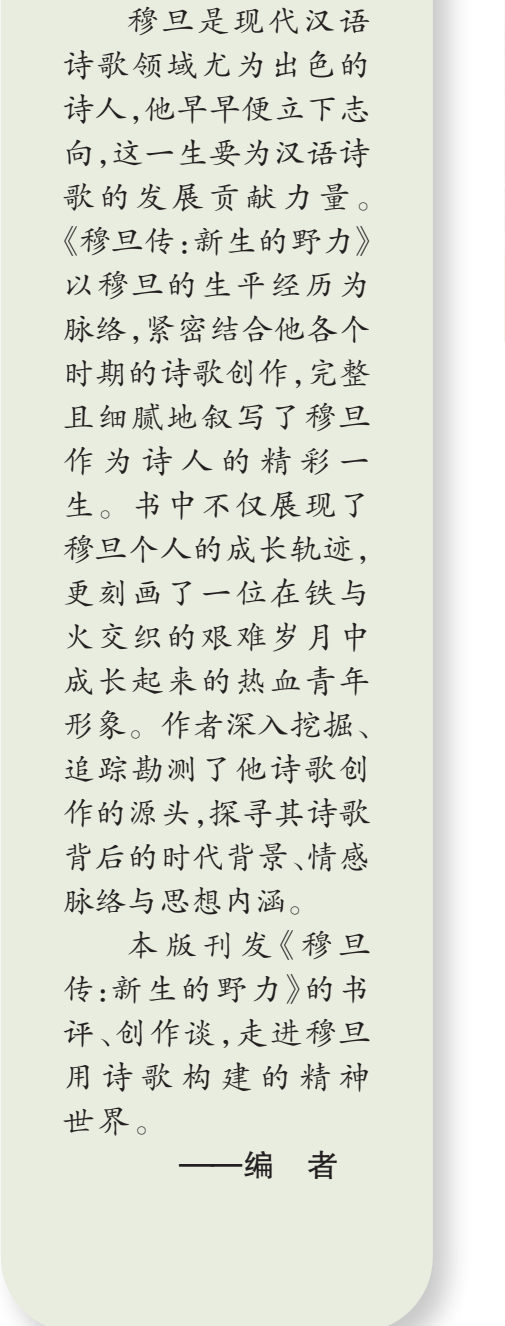
海宁一位不知其名的收藏家，知道我在写作，辗转要到我的电话，给我寄来了他从拍卖行竞购来的穆旦手写材料（复印件）。另一位收藏家老友，竞拍时，意外看到流拍的穆旦手写材料，当场拍了照片发我，供我写作时参考之用。

此传撰写期间，我的女儿邹宜笑正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利用高校校园网的便利，她也帮我下载了不少相关书籍和论文资料。此外，她的导师、著名评论家何平教授曾托她带来一大本自行装订成册的穆旦研究论文资料集。何平兄最后还都郑重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在此，我深鞠一躬。

感谢穆旦长子查英传，许多年前的越洋电话仍旧回响在我的耳边。感谢天津小说家秦岭先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元青教授、南开大学档案馆张兰普先生、自小在南开大学校园长大的穆旦同乡张文彬之子张尊先生等。感谢译林出版社副总编陆志宙女士和责任编辑张黎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艰辛努力。本书付梓之际，欣闻获“2024年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特此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南开大学一位不知名的老员工，在天津高铁站乘往里里台的公交车上，我巧遇这位退休多年的老人，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她告诉我，很多年前，她在南开校园里远远地见过低头行走、若有所思的穆旦。因为同在一个校区，她那时对诗人的不幸遭遇也有所耳闻。老人叹息一声之后，就跟我讲起了那些年的南开往事。临别的时候，这位眉清目秀的老人特意走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她的两个手掌中，然后，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用那根苍老而颤抖的食指，在我的手心里认真而动情地写了一个字。我没有记住这个字。但是，我记住了她跟我说的一句话：“今我不述，更待何时。你做的是有意义的事！”闻听此话，我心头一热，觉得十多年的资料搜集以及近一年高强度的写作期间所有遭遇到的困难都不值一提了。这也许是传记作者得到的最好的安慰，何况这句话，我何其有幸，能够当面从一位经历了往事的南开老人那里听到。我把这一切，看成了冥冥之中的穆旦找到他的对话者并热情赠予他的一种特殊的缘分。感谢这位传奇的翻译家和诗人，其卓越的才华和丰满的一生，20多年来默默滋养着我的写作。我想，这正应和了诗人的一行诗：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作者系作家、诗人）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邹汉明著，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

在20世纪中国诗坛的现代性探索中，穆旦的诗歌创作与译介始终惹人注目。他的人生轨迹与战乱时局中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相互映照，成为时代裂变下的独特注脚。穆旦的现代主义诗风源自其深厚的西学背景与跨文化视野，然而特殊的时代背景曾使其诗学成就长期被遮蔽，人生轨迹亦湮没于历史烟尘。历时17年，作家邹汉明以《穆旦传：新生的野力》重探这位诗人，通过大量档案爬梳与史料钩沉，复原了穆旦鲜为人知的精神史。

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穆旦研究资料的空白。穆旦的一生恰似一曲“咏叹时代动荡，追寻金色光芒”的命运交响。传记上部聚焦其前30年人生：从浙江海宁的家族根系，到天津出生后的北迁背景；从南开中学的文学启蒙、清华园的智性淬炼，到西南联大时期的创作勃发。青年穆旦的成长轨迹，始终贯穿着对民主进步思想的追寻。他因卓越的外语能力投身远征军翻译工作，命运与战争紧密纠缠，文人本色使其怀抱理想主义者的光芒。在诗学判断与价值取向上，穆旦始终保持着超越时代的现代性视野——这种精神特质，恰是邹汉明为其立传的深层动因。

从美国自费留学归国后，穆旦的远征军经历成为难以言说的隐痛，其人生叙事亦因缺乏自我

■创作谈

探寻穆旦的文学人生

□ 邹汉明

么说吧，那时我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又过了3年，忽一日，我心有所动，觉得除了写一点小诗，或许还可以做一点诗歌的研究。而穆旦无疑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选择。那时，我已经开始散文和诗歌评论的写作，觉得撰写一本评传性质的书，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目标既已定下，接下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计划一次又一次的外出采访了。

首先想到要去一趟海宁。这不但因为穆旦的祖籍地在海宁袁花。那时，也可能从秀州书局得到一个消息，说海宁政协有一位老先生正在撰写穆旦的传记。2003年8月24日，在当地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我冒着酷暑去硖石拜访陈伯良先生。我的愿望是向老先生借一册资料书，如蒙允诺去复印店复印一册，那是最理想的。

对于我的到访，陈先生显然感到突然。在他窄小而整洁的书房里，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的交流始终处在某种迟滞的状态。陈先生生活不多，声音很低，谨慎地应答着我。这在我是很少有的经历。最后竟至于连我也很少问话了。而于无声中，我终于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借阅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纪念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陈先生略略顿了一顿，抬起眼睛看了看我，转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书不知堆在哪里了，一时找不到。”初次见面，他当然也不便告诉我写作的计划。但他如此回复，似乎更加重了我的冒失。我脸上开始火辣辣的，甚觉惶恐不安。现在想来，且不说老先生对我也谈不上了解，那时他既已放笔在写，那册纪念集就是手头必备的资料，岂可须臾离身？正尴尬着，只听得陪同的朋友说了一句“先生一般不出借书”，这才解了彼此的窘困。

时隔多年，回忆那个场景，因我的唐突反倒历历在目。不过，今天我仍要感谢陈伯良先生跟我谈到他跟穆旦夫人周与良及其亲属多年的书信往来，也让我了解到家属对于穆旦传记的意愿。我知道，伯良先生着手早，跟穆旦的亲属熟悉，也多有交流，无疑占有资料收集的便利。可惜，那天因我的不安和过度的敏感、自尊，交谈没有深入，加之天热，汗流不止，大概坐不了多久，就匆匆告辞了。

2005年3月，我突然收到伯良先生签赠的《穆旦传》，这是诗人穆旦的第一部传记。收到的当天，我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记得电话里他转而问我，我的《穆旦传》写得怎么样了。我

实话实说还没写。他告诉我得抓紧时间写。据他所知，国内有研究者正赶写着穆旦的评传。电话那头，听得出，陈先生的说话是轻松的，全然不似初次交流时的那种沉闷和生涩。但这回到我支支吾吾了。其实，关于这部计划中的传记，由于资料搜集的难度，我差不多已经在打退堂鼓了。

二

2003年11月底，我赶去温州老城区花柳塘采访诗人唐湜。这一次，幸亏有当地作家程绍国兄的介绍和陪同，我很顺利地采访到唐湜。而且，还意外地获赠他书架上多余的一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应是唐湜《忆诗人穆旦》一文的两册样书之一）。唐湜见过穆旦，很早就写过穆旦诗歌的长篇评论，尽管他那时因小中风，话不多，且语多含糊，但从唐湜那里疙疙瘩瘩听来的穆旦，也给了我一种如在目前的亲切之感。

2004年1月31日，新年正月初十，在林莽和邹静之两位先生的介绍下，我去清华大学荷清苑采访诗人郑敏。在郑敏家里，我跟她愉快地聊了一个下午。临走，郑先生拿出《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紀念文集》交给我，告诉我可到附近的文印店复印一册。穷书生为了节省一点复印费，书中那几篇稍长且已有收集的文章我就跳过没有复印。所以，现在我手头保存的这册特别的纪念文集，根本就是缺页而不完整的。

北京采访结束，我又南下去了天津，走访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在天津诗友的帮助下，这次在南开东村采访到穆旦的邻居、同事辜璋高、董泽云夫妇，也部分地获得了诗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一些有意思的生活细节。辜先生后来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因担心采访时口头表述有不恰当的地方，他特别关照我以信中的文字表述为准。辜先生经历过非常时期，谨慎缘于他们那一代人背负的生活经验。其严肃如此，也颇令我动容。

也许是机缘巧合，在与穆旦交往密切的当事人中，我还采访过来新夏和杨苡。来新夏2004年来嘉兴参加图书馆的百年庆典活动，我跟他在秀州书局见面，坐下来听他聊他的“棚友”穆旦。来生跟我讲到特殊时期他与穆旦一道打扫游泳池和厕所的往事，讲的人和听的人，仍都感觉异常沉重。而杨苡，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曾致信问候，可惜当时未联系到她。不料15年后的2019年10月，经“青春诗会”诗友吴兵兄的介绍，我终于走进杨苡的书房。这一年，杨苡已过百岁，其思维之清晰，记忆力之好，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奇迹。因为事先已有电话联系，杨苡也有所准备。我们非常愉快地畅谈了一个下午的穆旦。临别，她亲自送我到小院子的门口，还一再地指引我回返的路径。我跟她说，希望过段时间能够再去看望她，杨先生说了一句：“欢迎！”顿了一下，睁着那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很有个性地告诉我：“我很少说欢迎的！”我跟杨苡的长谈，自然也纳入相关的章节。回家的路上，我感慨万千，甚至觉得，杨苡以她异乎寻常的长寿，似乎正等待着这一场关于穆旦的长谈。感谢这位睿智而直爽的老人为我带来了一个立体的诗人形象。

